

云南大学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

林文勋 主编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 历史与现状

林文勋 主编
邢广程



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

林文勋 主编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 历史与现状

林文勋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 历史与现状 / 林文勋, 邢广程主编.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 / 林文勋主编)

ISBN 978-7-01-012586-2

I. ①国… II. ①林… ②邢… III. ①边疆地区-政治制度史-研究-西南地区 ②边疆地区-政治-问题-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D6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780 号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 历史与现状

GUOJIHUA SHIYEXIA DE ZHONGGUO XINANBIANJIANG: LISHI YU XIANZHUANG

丛书主编: 林文勋

本书主编: 林文勋 邢广程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面设计: 徐 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2586-2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本书系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成果之一，得到云南大学专门史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总 序

林文勋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国的边疆地区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历朝历代莫不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与边疆治理。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凸显,边疆问题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并形成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边政学”、“边疆学”等概念,极大地推动了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目前,尽管人们对“边疆学”、“边政学”等概念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已没有人怀疑。构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大的范围开展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更多人们的认识。

云南大学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我国西南边疆建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长期以来,依托特殊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大批学者对边疆问题特别是西南边疆的问题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将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再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云南大

学边疆问题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蓬勃发展,并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潜力。中国边疆研究现已成为云南大学重要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在全力推进、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中,云南大学应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建设和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的重任。

基于此,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云南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水平与实力,2002年,我们提出了在云南大学建设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议并拟定了具体的方案。2007年,通过整合边疆问题研究、中外关系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力量,云南大学专门史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同年,我们又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下自主增设了“中国边疆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08年,我们再次抓住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的契机,提出“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作为云南大学国家立项的学科项目加以建设,旋即得到批准。

“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学科项目,计划从中国西南边疆史、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史和中国边疆学研究三个方面较全面地开展边疆问题的研究和中國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探讨。同时,还将有计划地整理有关西南边疆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次我们编辑和出版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就是为了系统地反映我们在推进边疆问题研究和中國边疆学学科建设中形成的研究成果,增进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决不只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增加,而是一种研究视野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

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设还将经历长期的探索过程并面临较为

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也仅只是在自己原有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开端。为此,我们真诚地期望各位专家学者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共同为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2011 年春节

目 录

总 序	林文勋(1)
“贝币之路”及其在云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意义	林文勋(1)
周边国际环境的新挑战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邢广程(17)
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	李国强(33)
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土司制度	李大龙(46)
范慎通、阮述使团来华新论	
——兼论《往津日记》与《建福元年如清日程》的	
价值	孙宏年(62)
中国发展与东盟互联互通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李晨阳(82)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外侨在云南边疆的居住与管理研究	
——以昆明为中心的考察	罗 群 黄翰鑫(94)
民国时期滇北金沙江两岸土司的衰落历程	
——以丁文江、曾昭抡等的考察	
为中心	潘先林 杨朝芳(116)
云南边境地区和境外诸国的阿卡人及其	
与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何 平(139)
《边政公论》之中国边疆研究概论	秦树才 刘晓光(154)

清代云南府级政区治所城池的新建与边疆

控制的强化 陈庆江(165)

环境史文献学刍论

——以西南民族环境史研究为例 周 琼(178)

论明代云南新本土文化的形成及特点 程舒宁(200)

1950年代中苏经济交往下的滇南经济发展 赵永忠(221)

边缘·腹地·前沿

——从历代治滇看云南历史地位的

动态变迁 陈碧芬(237)

秦汉至民国时期云南交通条件对华侨

出国的影响 陈 俊(259)

试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双轨政策 杨晓慧(268)

构建边疆学科的一次尝试

——私立五华文理学院边疆文化学系述略 ... 沙文涛(279)

“西南学”考论 娄贵品(294)

民国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兴盛的缘起 王振刚(308)

试论明代云南巡抚的职责及其作用 辛亦武(332)

清代云南的水权运作与纠纷调解 董雁伟 祁志浩(355)

清末云南司法审判制度的变迁 谢 蔚(378)

“走夷方”与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迁 黎志刚(390)

聚焦云南:在抗战“大后方”与大前沿之间

——全球视野下的云南边疆角色与地位 田晓忠(407)

个旧锡业全球化:基于产销关系的考察

(1644—1911年) 马 琦(426)

中国西南边疆视角下的越南青铜时代农业 陈 果(450)

“贝币之路”及其在云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意义

林文勋(云南大学教授)

—

西南地区经云南腹地很早就有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线。《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据有关专家考证,这条通道起始于成都,“其主干道分东西二路,西路(即古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渡金沙江入滇,经大姚到大理;东路亦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沿秦修五尺道南行,入滇后经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到达大理,东西二线在大理汇合后,经保山、腾冲到达缅甸,再西行至印度”。¹联系我国北方的对外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许多学者将西南地区经过云南腹地通向东南亚、南亚的交通通道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如熊永忠认为“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印度、缅甸等地的商人,通过‘丝绸南

路’把贝带进云南”。² 据上引史料,显然,这些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线上有无丝绸流动,这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史料中提到的“蜀布”并不等于就是“丝绸”。可见,上述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更主要的是受“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影响的缘故。也就是说,人们是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既有事实出发,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地将西南经云南腹地的对外通道定义为“丝绸之路”的。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19世纪后期提出的一个概念,³之后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同。它主要指我国古代西北陆上的对外通道。从中外学者的论述来看,⁴大家之所以一致地将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当是因为:第一,丝绸的流动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对其他商品的流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丝绸作为最为大宗的商品,对中外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第三,与此密切相关,丝绸成为联系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由此看来,要准确地确定一条对外通道的名称,关键在于看通道上何种商品流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以及其对中外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它是否成为联系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以此标准来衡量西南经云南腹地对外通道上的商品流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云南及西南输往国外的商品主要为一些土特产品,而东南亚和南亚输往云南及西南的商品则多为珠宝、玉石等贵重物;只是到了清代后期和近代,生丝一度才有大量的流通。因此,称这条通道为“丝绸之路”,显然不妥。

与丝绸的流通形成鲜明对比,在西南经云南腹地通向东南亚、南亚的对外通道上,东南亚、南亚的海贝却很早就大量流入云南。其流入时间,最迟自春秋战国起。此后,历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清初,海贝均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可见,海贝流入的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这些大批流入的海贝,从春秋战国起直至明

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一直作为云南主要的法定货币，流通使用两千余年，可谓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甚大。毫无疑问，海贝在古代一直是流动于西南经云南腹地通向东南亚、南亚交通线上的最为大宗的商品，并且是充当货币的特殊商品，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与其将这条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还不如称之为“贝币之路”，这更接近历史事实，也更为科学和准确。

考古发现证实了“贝币之路”的存在。

早在1941年，云南剑川河北村的元代火葬墓中就出土有海贝。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对滇西鹤庆、洱源、邓川、大理、下关、宾川、巍山、楚雄等地的大理国至明代的火葬墓进行调查，这些墓中大都发现了海贝。⁶

1955至1960年，云南考古工作队对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亲族古墓群进行四次发掘。在发掘的50座古墓中，有17座出土有海贝，总计约14万9千余枚，重400余公斤。⁷

1964年，在昭通大关发现的东汉崖墓中，其中三号墓出土海贝2枚。同墓还出土有王莽时期的金属货币“货泉”7枚，“大泉五十”22枚及东汉五铢300余枚。⁸

1972年，云南省考古工作队对江川县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在所发掘的27座墓中，第11、17、18、20、21、22、23、24号墓均出土有海贝。八座墓的海贝总数约11万2千余枚，重约300余公斤。⁹

1976年，在维修南诏晚期所建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时，对塔刹和基座进行清理，曾出土海贝10多公斤，约3800余枚。与之同时出土的有“开元通宝”和金、银、铜及水晶质地的佛像等。¹⁰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呈贡天子庙发现的古墓中，其中的第41号墓中，出土海贝1500余枚。¹¹

1980年,在剑川凤山发掘的217座古墓群中,有2座出土海贝。其中第81号墓出土43枚,第155号墓出土4枚。¹²

同年,在对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的发掘过程中,所有304座墓中就有112座发现海贝,总数653枚。每座墓1至20枚不等,但多数墓随葬贝在6至7枚之间。¹³

1986年,在对西双版纳景洪县曼阁渡口古墓的发掘中,出土海贝189枚。¹⁴

上述这些墓葬,年代最早的为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唐、宋、元历代均有,最晚的为明清时期。可以推定,在自春秋战国至明清的数千年间,云南一直有海贝输入。

王大道先生在《云南出土货币初探》一文中,根据云南考古出土的海贝,绘制了《云南出土货币分布图》,该图显示,海贝分布的路线,除少量分布在滇南的景洪、墨江、绿春等县市外,大多沿滇西向东,围绕腾冲—大理—楚雄—禄丰—晋宁—昆明—曲靖—大关一线呈轴状分布。¹⁵其中,大理洱海区域和滇池区域是海贝出土最为广泛的两个核心区。这条轴线,正是云南古代对外联系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这充分说明,云南古代的对外交通线就是一条“贝币之路”。

二

云南古代墓葬中出土的海贝,经有关人员寄往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鉴定,结论是:“其产地是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域,包括印度、菲律宾以及我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南海诸岛附近。”¹⁶其中,又有相当数量是来自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可以肯定,云南所发现的海贝并非本地所产,而是来自于南亚和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

据中外书记载,南亚和东南亚一带不仅盛产海贝,而且长期以海贝作为货币使用。在长期使用海贝的过程中,东南亚、南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贝币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云南海贝的供给地。《马可波罗行纪》在记述哈刺章(大理)用贝作货币时即说:“彼等亦用前述之海贝,然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¹⁷

那么,东南亚、南亚的海贝是怎样大量流入云南的呢?

如前所述,云南很早就有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线。西汉,张骞在大夏所看到的蜀布、筇竹杖就是沿着春秋战国即已存在的“蜀身毒道”运往印度和阿富汗等地,这说明当时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一直有着较为频繁的商品贸易。东汉时期,云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这条道路在中国与海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公元94年到公元166年,东南亚、南亚的掸国、日南等曾多次经云南到汉都洛阳朝贡。其中,永宁元年(120),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到洛阳献乐时,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还带来了“海西大秦幻人”。延熹九年(166),据《后汉书》卷118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说明云南的对外通道通过东南亚、南亚还可通往阿拉伯地区直至欧洲。正因为交通的畅达和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位于滇西的永昌城成为异物交汇的地区。《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说:永昌“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貂兽”。其中,轲虫就是海贝,它与虎魄(琥珀)、琉璃等并非云南所产,而是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继续保有发达的对外交通。《三国志·魏书》卷30引鱼豢《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

物。”这说明云南通越南一带的交通颇为畅达。与此同时,云南通往印度等地的古道也十分畅达。《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也。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这里提到的骠人和身毒之民应是到永昌经商的侨民。看来当时贸易的发展应十分繁荣。否则,永昌有骠人和身毒之民是不可想象的。

唐宋时期,云南的对外交通更有发展。唐代,据樊绰《云南志》的记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多有交通往还。在这些交通线上,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城市。如银生城(今景东),“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闍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¹⁸宋代,北宋熙宁八年(1075),杨佐入云南买马,在云南驿前见到所标记的“里堠”。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¹⁹从“悉著其道里之详”来看,其交通应该是很畅达的。南宋时期,曾有东南亚、南亚的犀象等物品经云南流到四川黎州边境。当时,这条通道上不仅有商品流动,而且还有人员往还。五代宋初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说:“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壤,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繫于成都府。”²⁰

元、明、清时期,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中原王朝在云南大力发展驿站交通,云南内部交通状况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内部交通的发展又拉动了对外交通的长足进步。元代,不唯印度的海贝经对外通道进入云南,云南大理所产的良马,“躯大而美,贩售印度”。²¹明清两代,据谢肇淛《滇略》的记载,云南商人从缅甸将紫英、云母、水精、绿玉、碧真、古喇锦、西洋布、孩儿茶等贩运到

云南。这些商品,“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²²

以往,大凡提到云南的对外交通,人们多想其受崇山峻岭的分割和阻隔,长期处于一种沉寂状态。事实上,横亘于西南的高山、大河并没有挡住古代先民对外的开拓。从上面历代云南对外交通的发展情况来看,云南的对外交通一直十分畅达,并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东南亚、南亚输入云南的海贝,正如下面即将揭示的,既是货币,也是一种重要的商品。既然存在频繁的贸易和经济交往,就必然会有商品的流动,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东南亚、南亚的海贝,正是通过双方的贸易,沿着云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对外通道不断流入云南的。前引《汉书》记载汉代永昌郡有犛虫,元代《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大理使用的贝币来自印度,²³以及明代谢肇淛《滇略》卷4《俗略》条讲:“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诸海中,不远千里而捆致之。”这些均可为证。

三

从东南亚、南亚输入的海贝到底在云南作何用途,目前存在一些争议。

对于这些海贝,究竟作何用途,长期存有争论。方国瑜先生认为,云南用海贝作货币始于唐代,在此之前,贝是用作装饰品的,而不是货币。他的根据是,第一,“在战国末年以前,云南各地的部族,社会生产力落后,即虽有贝只能用作装饰品,还不到发展为货币的时期。庄蹻来了,也不能把楚国货币流通在云南,因为货币是社会生产条件所决定的”。第二,晋宁石寨山发现的贝,贝面均无

穿孔,这与明代云南各地坟墓中掘出的贝不同。“明代坟墓中的贝是作为货币用过的,都有穿孔的小洞,我所见过的贝都如此”。²⁴并且,古代中原和世界其他民族用作货币的贝,都要穿孔,以便用绳索穿连成串。而云南这时的贝无穿孔,显然不是用作货币。

江应樑先生认为,云南春秋以至西汉墓中的海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他说:“一般都说云南之用海是始自楚庄蹇王滇时,这话虽不尽可靠,但我们却可相信,云南之以海作货币,其起始必甚早,中间一贯相沿,直到元明时大批汉民族移殖滇中,尚不能改革这种夷制而仍相随着使用海”。²⁵李家瑞先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关于云南用贝币的记载,初见于《新唐书》的《南诏传》(见后),但是用贝做货币不会是始于南诏的,照亚洲各民族用贝币的通例,都是接着以物易物之后,也就是一个民族在物与物交易之后,开始用的货币必是自然物”。又说:“近年云南省博物馆在晋宁县石寨山发掘得一座少数民族女酋长的墓,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小贝,为数在二万枚左右,分装在特制的很精致的四件青铜器内,从同时出土的器物及别县出土的墓葬证明它确实是西汉的贝币,但多到万数,储藏的器具又是为贝特制的,那已不是初用或少用时的情况,可知云南用贝做货币,已早在西汉以前了。”²⁶李家瑞先生将云南西汉及其以前的贝看作货币,从文中的论述来看,主要论据是,白族、纳西族等民族财富、赌博等的读音和写法均与“贝”字有关,云南先民的原始货币是贝币。

杨寿川教授补充并发展了云南西汉及其以前的海贝是用作货币使用的观点。在《云南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一文中,他提出:“云南滇池区域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大致是战国时期,这一推断或许更接近于历史事实一些”。²⁷其论据是:第一,贝币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货币。云南发现的海贝,来源、种类、计数单位均